

# 纪念盛京定名380周年学术文集

白文煜 主编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纪念盛京定名380周年学术文集 / 白文煜主编.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5441-6109-1

I. ①纪… II. ①白… III. ①沈阳市—地方史—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K293.1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88378号

---

出版者: 沈阳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10号 邮编: 110011)  
网 址: <http://www.sycbs.com>  
印刷者: 辽宁省印刷技术研究所  
发 行 者: 沈阳出版社  
幅面尺寸: 180mm × 250mm  
印 张: 29.75  
字 数: 450千字  
出版时间: 2014年8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姚德军 陈耀斌 薛天宇 李姝梦  
封面设计: 杜 江  
版式设计: 万越制版  
责任校对: 伊 凡  
责任监印: 杨 旭

---

书 号: ISBN 978-7-5441-6109-1  
定 价: 108.00 元

联系电话: 024-24112447  
邮购热线: 024-62564933  
E-mail: sy24112447@163.com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纪念盛京定名380周年学术文集》

编辑委员会

-----  
顾 问\ 李治亭 徐 凯

编委会主任\ 白文煜

编 委\ 白文煜 李声能 王 琦

李 理 佟 悦 王艳春

王爱华

主 编\ 白文煜

副 主 编\ 李 理

编 辑\ 黄 嘉 邓 庆

纪念盛京定名380周年学术文集

## 前言

盛京，满语音译为“穆克敦”（Mukden），它是清代沈阳城的另一个代称。380年前，即后金天聪八年——公元1634年，清朝开国皇帝清太宗皇太极正式将沈阳更名为盛京城。

研究沈阳的历史与文化，离不开清王朝的崛起和发展，必然要以其迁都沈阳、定名盛京这样一些里程碑式的事件为出发点。

—

后金天命六年（1621），努尔哈赤统率八旗军进攻辽沈之地，很快攻克沈阳、辽阳等大小城池。不久，即将国都由赫图阿拉迁往辽东重镇辽阳。十年（1625）三月，身处辽阳东京城中的努尔哈赤，在辽南沿海明军不断攻击，特别是在辽东汉人持续反抗的浪潮中，于仓促之间被迫做出一项决定：迁都沈阳。

此时，后金都城辽阳新城刚刚建成不久，汗宫和诸贝勒府也刚刚入住，大小贝勒和诸大臣极不情愿迁都，遂纷纷谏言不便搬迁。努尔哈赤顶着诸贝勒反对意见，毅然决断：“朕筹此熟矣，汝等宁不计及耶？”于是开始了集体大迁徙。数日，后金都城和国人便搬移到北部120余里的沈阳城。

努尔哈赤实施的迁都决策，在当时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即被迫撤退。女

真人本来是一个长于迁徙的游猎民族，他们因时而动，四处为家；建立大金国前后，其国都亦曾因时势需要而数次迁移，如佛阿拉、赫图阿拉、界藩、萨尔浒、辽阳等等。

但是，从历史的角度再次回望，努尔哈赤这个看似平常的迁都决定，对于后金（清）朝历史来说，却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决策，对于辽东边镇沈阳城来说，更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正是因为此次迁都，最终造就了大清的龙兴基业，成就了盛京——沈阳无比光辉灿烂的未来！

## 二

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后，将自己的汗宫建在了城北门（镇边门）以里，在沈阳城中心区域，则修筑了至今仍巍然屹立的大衙门，即笃恭殿（后改称大政殿）和十王亭，由此掀开了沈阳城市史的新篇章。

天聪元年（1627），皇太极继承汗位，开始了后金历史的新阶段。此后，他一方面对外发动对明、蒙古和朝鲜的开拓战争；另一方面则加强国内治理和建设，如削除三大贝勒权力，实现“南面独尊”，扩建皇家宫殿，将沈阳城四门、十字街改为八门、井字街，增建坛庙、塔寺等城市设施。

天聪八年（1634），皇太极在国家实力不断强盛条件下，将国都由原来的“沈阳”，更名为“盛京”，按满语原意为“兴起、兴盛之京”——由上天恩眷的都城。在此前后，沈阳已由原来一座辽东小城，开始了它辉煌的历史。

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在盛京皇宫正式称帝，将国号“金”改为“清”，从此，盛京城即与清王朝的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以说没有盛京的建设，就不会有清王朝的开国；而清王朝的建立，则使盛京城变为一座名副其实的强国之都。

## 三

公元1644年春，6岁的清世祖福临在盛京皇宫刚刚登基三个月，在关内，李自成统率大顺农民军已攻破明朝首都，占领北京，明思宗崇祯皇帝上吊殉国。此前，侦知农民军动向的清朝当权者已做出应对措施：执掌朝权的摄政睿亲王多尔

纪念盛京定名380周年学术文集

衮亲率八旗劲旅由盛京启程，挥师西进，逼近长城。不久，清军在故明将领吴三桂投顺引导下，开进山海关，很快击败李自成农民军，占据北京城，实现了满人数十年入主中原的夙愿。

同年10月，小皇帝福临在孝庄太后等人陪伴下迁都北京，开始实现统一全国的大业。而此后的盛京沈阳，则成为清朝陪都，盛京皇宫已变成赫赫有名的陪都宫殿。

正是由于盛京城和盛京皇宫在大清开国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清历代皇帝均将这里视为龙兴之地、国家根本，从康熙朝开始，清帝开始实施东巡谒陵、祭祖、参拜祖先旧官的活动。至宣宗道光朝，共有康熙、乾隆、嘉庆、道光4位皇帝10次东巡盛京，极大提高了盛京的影响力及社会地位，同时也为盛京带来数以万计的宫中御用器物和皇家内府珍藏，从而使盛京地区在文化方面，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清代乾隆至嘉庆朝，清宫内府和盛京衙门曾奉皇帝谕旨对盛京皇宫以及盛京城、城内外众多设施进行改建和扩建，使盛京地区的文化建设进一步完善。所有这些，使盛京——沈阳晋升为关外紫禁城和皇家文化宝库。

从清初到清末，从民国到现代，380年的时光转瞬而过，一代又一代的人民繁衍生息在盛京的沃土。我们今天按学术研究的方式来编辑一册纪念文集，与其说是回顾盛京的历史和文化，不如说是回望我们自己，回望我们曾经走过的足迹。在那些史料详实、内容丰富的一篇文章，不仅会使人了解过去，也会使我们感知、感悟自己的优劣、美丑，这将促使我们在今后的生活中、事业中，真正做好自我，使盛京这个历史名城在我们的传承中继续熠熠生辉！

白文煜

2014年8月11日

# 目 录

前 言	002
-----	-----

## 第一章 盛京历史与文化

关于15至17世纪东北地区民族关系的几个问题	
——以满洲民族共同体的发展为视角	徐 凯 002
论努尔哈赤、皇太极统一黑龙江地区各民族的策略	周喜峰 027
多尔袞死因考	李治亭 040
清代沈阳名士张又龄与朝鲜望族李晚秀兄弟	
——兼论盛京地区与中韩文化交流	张 杰 055
与沈阳有关的两位制瓷名家——唐英与杜重远	刘 竞 067
清改沈阳为盛京考述	杜家骥 083
盛京文化发展历程及启示	张玉兴 085
清朝陪都盛京总论	丁海斌 王爱华 097
世纪回眸	
——辽宁满学研究	关嘉禄 113
关于传承和保护沈阳城市文脉的断想	王绵厚 125
论清代东北地区统辖管理体制的特征	暴景升 130
清代盛京将军与陪都机构权力关系的演变	孟繁勇 151

纪念盛京定名380周年学术文集

论陪都宫殿与盛京文化	李贤淑	168
满族语言与萨满文化	赵阿平	179
论清代祭典制度	刘中平	198
清初安达里墓及有关问题	刘长江	208
清盛京地区各衙门的职掌及行政关系探究	王月	217
清初辽阳府、县建立始末	梁戈峰	231
东北地方当局在“闯关东”潮中作用	范丽红	238
盛京老店铺今昔	齐守成	249

## 第二章 盛京皇宫与盛京古代建筑

满族“融合式文化”在盛京城空间格局中的反映	陈伯超	264
满族民居的地域文化特征	佟悦	276
沈阳故宫早期建筑与满族民居习俗	韩春艳	291
沈阳故宫早期建筑的特点及等级	孙启仁	303
浅析沈阳故宫建筑木构的民族性和地域性	朴玉顺 陈伯超	312
沈阳故宫建筑彩画现状的评估与断代	王成民	319
对乾隆初期修建盛京皇宫再认识	白洪希	331
沈阳故宫建筑使用新探	王艳春	340
参与建造盛京宫殿的辽阳人——雷弘化	李大伟	353
龙砖彩瓦出海州		
——清代东北地区琉璃官窑黄瓦窑及其历史价值	李理	359
民国时期沈阳故宫古建筑的使用与修缮	邓庆	372
北京故宫与沈阳故宫的比较研究	黄希明	388
盛京福陵、昭陵空间组合与建陵思想比较研究	李声能	399
关于清昭陵建筑等若干问题的研究	陆海英	410
盛京贤王祠崇祀的皇帝心膂：萨哈廉与允祥	王丽	421
北塔法轮寺与蒙古族满族锡伯族关系述论	赵志强	435
清盛京城瓮城初探	张树范	448
盛京西北角楼清理报告	李晓钟	462
后记		468

纪念盛京定名300周年学术文集

第一章

盛京历史与文化

# 关于15至17世纪东北地区民族关系的几个问题

——以满洲民族共同体的发展为视角

徐 凯

北京大学历史学院

## 一、关于民族关系的一些概念问题

一个学术概念的产生，往往是某个领域研究理念上的提升，或是研究理论框架的构建。上个世纪20年代以来，中外学界研究我国民族关系史不同的历史阶段，出现了一批鲜明的概念，诸如，“汉化”、“华化”、“胡化”、“同化”、“融合”、“融化”、“涵化”、“文明化”等，这些提法，既是学者们长期的深思熟虑所得，又体现出一个时期民族关系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兹择其要者数例，略评如次。

早在20世纪20年代，当“中国最被人看不起之时，又值有人主张全盘西化之日”<sup>1</sup>，陈垣发表了《元西域人华化考》一文，主要阐述元代西域诸族人来华后研习汉文化，在文学、建筑、医药等方面的重大成就及丰富著述，证明元代“西域人之同化中国”。率先提出“华化”与“同化”的概念。所谓“华化”，一般是指“改从华俗，且于文章学术有声焉”。因为元代西域

<sup>1</sup> 陈智超编注：《陈垣往来书信集》，页818，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人大批东来，在中土定居生活后，不可避免地要接触汉文化。于是不少西域人在文学、艺术、哲学、史学等方面取得很高的造诣，用汉文字从事创作，涌现出高克恭、马九皋、萨都刺、迺贤、丁鹤年……这样一批优秀的文学艺术家。元代西域人“华化”现象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景观。该文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表后，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匡其学术趋势，<sup>2</sup>也奠定了陈垣作为国际学者的地位。

陈寅恪运用欧洲近代史学家“民族（种族）—文化”的研究视角，探讨我国中古时期民族关系，因受周围环境影响而发生转化，产生双向的“同化”现象，并给予历史演进以很大的影响<sup>3</sup>。他一再强调，“北朝胡汉之分，不在种族，而在文化”。并举史例为证，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为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区别，即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之关系较轻。其《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说明北朝汉人、胡人之分别，不论其血统，只视其所受之教化为汉抑为胡而定之确证。指出胡化、汉化问题实际上是胡汉文化的对立，判别胡人和汉人是以所受文化，而不以种族和血统为依据。<sup>4</sup>他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对此又作了系统的论证，指出河朔地区与中央存在着严重的文化对立。<sup>5</sup>河朔地区在安史之乱以后存在严重的胡化现象。在他的整个史学研究中，“胡化说”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以民族和文化视角切入，“胡化”和“汉化”的转化，是陈寅恪打开研究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政治史之门的一把钥匙。

1950年，吕振羽出版了《中国民族简史》一书，以史实为例，认为华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力量促成了他族融化于华族之中，“成了华族的构成部分”。<sup>6</sup>他总结了历史上民族间斗争同化的三种情况，一是各个民族在没有进到国家时代的部落间的斗争与同化，“为争夺适合生存的自然条

<sup>2</sup> 参阅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之陈寅恪《重刻序》，页157，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sup>3</sup> 参阅周樑楷《傅斯年和陈寅恪的历史观点—从西方学术背景所作的讨论（1880~1930）》，《台湾大学历史学报》，1996年第20期。

<sup>4</sup>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页7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sup>5</sup>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页25，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sup>6</sup> 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页19，三联书店，1950年版。

纪念盛京定名380周年学术文集

件，引起原始战斗。结局不是战败者被迫退出其原在地区，便是参加战胜者的部落联盟”。二是已经进入到国家时代的民族与没进入到国家时代的民族间的斗争，结果是“与汉族斗争的各落后民族，每每被汉族同化，或在文化上模仿汉族，但他们也每每把汉人同化和在文化上影响汉族”。三是彼此都进入到阶级社会时代的民族间斗争，由于汉族力量的总和常常大过某方，结局是“汉族常占优势，侵略汉族而取得其支配权的民族，反而其大部甚至全部同化于汉族，自然也由不少汉人同化于他们”。<sup>7</sup>这是建国初期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研究民族史的一部力作。

70年代一场关于女真和汉族之间的“汉化”、“同化”、“涵化”的讨论在美国学界展开。1976年，美籍华人陶晋生教授发表*The Jurchen in Twelfth-century China: a Study of Sinicization*（《十二世纪中国女真汉化研究》）<sup>8</sup>一书（1981年中文译本在台湾出版，更名《女真史论》），该书以人类学中的“同化”（*assimilation*）、“涵化”（*acculturation*），以及由两个概念上发展而来的“汉化”（*sinicization*）理论观点，探讨了金代女真人的汉化问题。指出中国传统史学多认为中原王朝和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体现了一种单一的文化系统，即边疆少数民族逐渐融合于中华文明之中<sup>9</sup>。女真征服者一方面积极采取中国官僚制度，利用汉官，来巩固其新政权。而对待儒家文化，择善而从，同时推行以恢复固有文化为中心的改革运动<sup>10</sup>。约翰逊（*Constance A. Johnson*）以史实证据不足，说明陶氏在此“同化”概念之下，处于从属地位的小族群，而被整合（*integrated*）到大民族之中。这个“同化”概念所蕴含的不止是语言和社会行为上的涵化，而是一种“结构性同化（*structure assimilation*）”的族群间界限的消失。杜奈尔（*Ruth W. Dunnell*）则认为，该书过于简单地套用了华莱士等人的“同化”概念，而没有分析此概念所产生的历史语境，不同意将处于征服者地位的女真人视为汉民族的

<sup>7</sup>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页208-209，三联书店，1950年版。

<sup>8</sup>Jing-shen Tao（陶晋生）：*The Jurchen in Twelfth-century China: a Study of Sinicization*（《十二世纪中国女真汉化研究》），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6, ix。

<sup>9</sup>同上注，页X。

<sup>10</sup>参见*The Jurchen in Twelfth-century China: a Study of Sinicization*（《十二世纪中国女真汉化研究》），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6, ix。《女真史论》，pp.2-3。

“从属”族群。指出陶氏并没有构建足够清晰的标准，以便能够从范围、特点、以及重要性上来考察女真民族是否发生“同化”，或是“汉化”。而该书提供的证据无法支持作者给出的女真民族“汉化”的理论和概念<sup>11</sup>。包弼德（Peter K. Bol）通过金代知识分子阶层的研究，提出了用“文明化（civilization）”来解释女真族在十二世纪的政治文化变化比“汉化”更加贴切。认为理解金史的关键是女真人是少数民族征服者，可以采用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也可以使用汉民族的生活习俗，但是他们在民族认同上仍然认为自己是女真人而不是汉人。“汉化”这一概念在金史上并不适用。<sup>12</sup>这一问题的讨论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台湾中正大学举办“汉化、胡化、洋化：中国历史文化质变与多元化性格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结集出版了《胡人汉化与汉人胡化》<sup>13</sup>一书。

翁独健在《论中国民族史》一文中指出，历史上的民族同化是指一个民族或其一部分失去原来的民族特点而成为另一个民族的一部分。同化有两种，一种是强制同化，是民族压迫的表现；另一种为自然同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至于“民族融合”一词，往往被用来指两种情况。一是指历史上的一些民族，或者这些民族的各一部分，互相融合成一个新的民族。二是指民族关系发展的最高形式，即在共产主义的基础上，民族差别逐渐消失，全世界所有民族形成一个整体。在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必须用民族平等的原则去分析、对待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都应当用同一个标准进行衡量与评价。<sup>14</sup>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讨论民族“同化”、“融合”代表性的论文。

近百年来，研究民族关系问题所用的“同化”、“华化”、“涵化”、“文明化”、“融合”、“整合”等概念，从多学科视角阐述了不同历史阶

<sup>11</sup> Ruth W. Dunnell 杜奈尔：“Review: The Jurchen in Twelfth-Century China: A Study of Sinicization by Jing-Shen Tao”（《书评：十二世纪中国女真汉化研究》），Sung Studies Newsletter 宋辽金元 No.13 (1977年)，pp.75-79。

<sup>12</sup> Peter K. Bol（包弼德）：“Seeking Common Ground: Han Literati under Jurchen Rule”（《求同：女真统治下的汉族文人》），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哈佛亚洲研究》），Vol. 47, No. 2 (Dec., 1987)，pp 461-538。

<sup>13</sup> 汪荣祖等主编：《胡人汉化与汉人胡化》，《台湾人文研究丛书》2，2006年版。

<sup>14</sup> 翁独健：《论中国民族史》，页7-8，《民族研究》1984年第四期。

纪念盛京定名380周年学术文集

段民族关系的发展历程。这些研究不是从种族、血缘、体质等特征出发，而是突出民族与文化的变异，即先进文化对落后文化的影响，汉族的农耕文明对周边民族游牧文明等的吸引，所谓的“华化”和“胡化”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互动转化的。以此达到弘扬中华民族的辉煌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在强势民族、弱势转为强势民族和一般民族之间的关系，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同化”和“异化”是同时进行的，或以激烈的战争方式强迫进行，或以主动归附的平和方式展开，少数民族既吸纳他族的文化，又顽强地保持本民族的特色，逐渐形成了各自的民族共同体，有的民族则分化到若干各族中而消失。历史证明，满洲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也体现了这一过程。

## 二、辽东经济圈的形成与建州女真的南迁

辽东经济圈的形成是经过辽金时期的积累，构成于明代前期辽东都司卫所之上。明初，朱元璋就非常注重辽东的治理，“肘腋重地，建置雄镇，藩屏攸赖”<sup>15</sup>。洪武四年（1371）二月，置辽东卫指挥使司<sup>16</sup>。七月，置定辽都卫指挥使司治辽阳，“总辖辽东诸卫军马”<sup>17</sup>。八年十月，明廷改在外各都卫为都指挥使司，即称辽东都指挥使司，<sup>18</sup>。十年（1377），尽革前置州县，“但立卫所，以兵戍之”。七年，派钦差镇守辽东地方总兵官，之后，又钦差镇守辽东太监、巡抚辽东地方都察院御史，其治所相继由广宁移至辽阳。二十九年（1396）十月，山东按察使司置辽阳按察分司，即辽海东宁道，管理辽东都司司法事务。尔后，增设辽东按察分司，称分巡道，常驻辽阳，专理词讼。辽东都司以及中央钦差大员、山东按察使、布政使司派驻机构会聚辽阳，共同治理辽东和东北地区的军政、民政、边防、夷务，又重新恢复辽金时期的辽阳重镇的历史地位，对东北疆域的巩固起到重要的作用。

<sup>15</sup>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册十二）卷三七《山东八·辽东都指挥使司》，页1698，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中华书局，2005年版。

<sup>16</sup> 《明太祖实录》卷六一，洪武四年二月壬午，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校印，中文出版社发行。以下版本同。

<sup>17</sup> 《明太祖实录》卷六七，洪武四年七月辛亥。

<sup>18</sup> 《明太祖实录》卷一一，洪武八年十月癸丑。

辽东都司领卫二十五，所十一，营堡百，州二。主要分布于辽东、辽西、辽南、辽北地区。定辽中卫，洪武十七年（1384）置。定辽左卫，洪武六年（1373）置。定辽右卫，洪武六年置，嘉靖四十五年（1566）移治凤凰城。定辽前卫，洪武八年置。定辽后卫，洪武八年改置。东宁卫（以上诸卫治所俱在今辽阳老城），洪武十九年，改东宁等千户所置。海州卫（治所今海城），洪武九年置。盖州卫（治所今盖州），洪武九年置。复州卫（治所今瓦房店西北），洪武十四年置。金州卫（治所今大连东北），洪武八年改显州置。广宁卫，洪武二十三年（1390）置。广宁中卫，洪武二十六年置，建文四年（1402）废。广宁左卫、广宁右卫（以上四卫治所在今北镇）两卫，置废时间同广宁中卫。义州卫（今义州），洪武二十年置。广宁后屯卫（治所在今北镇），洪武二十五年置懿州（治所在今阜新东北），永乐八年（1410）移治义州卫城。广宁中屯卫，洪武二十四年置。广宁左屯卫（前二卫治所在今锦州），洪武二十四年置，永乐元年，治所由辽河西迁至广宁中屯卫城。广宁右屯卫（治所在今凌海东北），洪武二十六年置。广宁前屯卫（治所在今绥中西南），洪武二十六年置。宁远卫（治所在今兴城），宣德三年（1428）置。沈阳中卫（治所在今沈阳老城），洪武二十年置，天启元年（1621）地为后金占。铁岭卫（治所在今铁岭），洪武二十一年置，五年后移治铁岭。三万卫（治所在今开原东北老城镇），洪武二十年置。辽海卫（治所在今昌图县西），洪武二十三年置，二十六年移治三万卫。另属安乐州（今开原东北老城镇），永乐七年（1409）设，安置北方民族降人。自在州（今辽阳老城），初置同安乐州，后移治辽阳城内。<sup>19</sup>清初一些卫改置府州县。

辽东经济圈与都司卫所具有四种功能密切相关，（1）卫所是军事屯垦中心。镇守辽东总兵官，下属副总兵、参将、游击、守备、把总等。都司设都指挥1人，都指挥同知2人，都指挥僉事4人。卫所设长官指挥使，副职指挥同知、指挥僉事，所以千户、百户为长官，下置镇抚、总旗、小旗等。都司与卫所，各卫所之间，通过千户、百户所、营堡，以及驿站相连。兵卫之政，“以军隶卫，以屯养军”，以戍边、屯种为主，兼顾煎盐、炒铁。这套军事

<sup>19</sup> 参阅《读史方舆纪要》（册十二）《舆图要览·辽东边图》，页6040-6044；顾炎武《肇域志》册二《辽东都指挥使司》，页769-782，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纪念盛京定名380周年学术文集

管理体制比辽、金、元行政制度更加严密，成效更显著。（2）卫所是行政管理中心。辽东都司行政、刑狱事务由山东承宣布政使司派出机构兼管。都卫设立断事司，置断事、副断事各一人，专理“军官军人词讼”<sup>20</sup>。具体事务则由基层卫所的镇抚司处理，“无狱事，则管军”，也兼涉寄籍民（嘉靖时期数量加大）的诉讼。（3）卫所是贸易交换中心。辽东物产富庶，种类繁多<sup>21</sup>。按照明代一府设所，数所设卫的建置的原则，卫所治地也是“商贸要冲”，物质集散地。永乐三年，立开原、广宁两重镇马市。开原城南，以待海西女真；城东以待它族。广宁团山堡以待朵颜等三卫蒙古。“马市为夷货流通之府”，“夷人以市为金路”。明廷规定马匹兑换绢布的价格，确立互市的日期。官市、私市并举，交易布帛、粟米、杂货。<sup>22</sup>天顺八年（1464），抚顺开关，专对建州女真贸易。之后，又辟清河、绥阳、宽甸互市。时人有诗云：“累累椎髻捆载多，拗辘车声急如传。胡儿胡妇亦提携，异装异服徒惊眴。……夷货既入华货随，译使相通作行眩。华得夷货更生殖，夷得华货即欢忭。”<sup>23</sup>讴歌了马市的一片繁盛。此外，各个卫所治地也皆是贸易之区，与四周经济往来越发密切。（4）卫所又是文化教育中心。都司和卫所普遍建立儒学，书院、社学。洪武十四年建都司学，并立先师庙、启圣祠、尊经阁。各卫亦建卫儒学，分别由教授、训导等主事，教授武官子弟，除了经史外，还讲授御制《武臣鉴戒》、《百将传》等。之后，又“建武学，用武举”。辽东州县改卫所时，州县儒学或改或并入卫学。到嘉靖十六年止，辽东建立书院6所，辽阳的辽左书院、辽左习武书院，广宁的崇文书院、仰高书院，锦州的辽右书院，蒲河的蒲阳书院。建社学25所，辽阳6个，广宁4个，余为各卫社学。<sup>24</sup>“盖人文渐以著矣”。仅以科举考中进士一项为例，从正统

<sup>20</sup> 《明太祖实录》卷六一，洪武四年二月癸酉。

<sup>21</sup> 参阅〔嘉靖〕《全辽志》卷四《方物》，诸如谷菽、蔬菜、果品、木材、花草、药材、禽鸟、动物、鱼虫、矿物等。《辽海丛书》第一册，页632-634，辽海书社，1985年版。

<sup>22</sup> 参阅《全辽志》卷三《兵食·边略·马市》，页401-402；〔清〕林佶《全辽备考》卷下《马市》，《辽海丛书》第四册，页2229。

<sup>23</sup> 《全辽志》卷六《艺文下·广宁马市观夷人交易》，页676。

<sup>24</sup> 参阅〔正统〕《辽东志》卷二《建置·学校》，《辽海丛书》第一册，页377-380，辽海书社，1985年版。

十年（1445）至嘉靖四十一年（1562），百余年间，辽东地区中进士58名，其中辽阳24名，广宁12名，锦州8名<sup>25</sup>，可见三地人文之盛。辽东都司的这样四个特征，与北方边陲的奴儿干都司、喜峰口外的大宁都司相比，更显示了它的经济、文化中心的突出地位，引领着东北地区的发展趋向。

辽东都司辖地东自鸭绿江，西至山海关；南起旅顺海口，北达开原；方圆千余里，与周边交通便捷。其道路的主干线是驿站，干线是连接州县和卫所、主要商埠之间、市场与产地、水路码头和车船环城地点的要道，后者多见于商书路引。<sup>26</sup>明初至万历时期，该都司由38个驿站、41个递运所、4个安插所，与卫所相连。加之京城分别至辽东都司治所、金州卫、复州卫、海州卫、盖州卫、三万卫、沈阳中卫、义州卫、广宁卫，均有水马驿、马驿两条路相通。<sup>27</sup>开原由驿站南下经辽阳、广宁、山海关至北京，北上可通昌图、梨树、怀德、农安等地。而富商大贾穿梭于交通干线，沟通南北物质。这样就构成一个联络紧密的交通网络，通过它传达政令，递呈军情，迎送使客，转运物质。应当说，正统以前，“尤北虏要冲”的广宁为钦差大员驻地，此为辽东重地<sup>28</sup>。之后，治所中心陆续东迁辽阳。构成了一个以辽阳为核心地带，北至开原、铁岭，南达海州牛庄、盖州、复州，西自宁远、锦州、广宁、义州，东到抚顺、清河、绥阳、宽甸、凤凰城栅门（延伸朝鲜中江、会宁、庆源）等为边缘地区的辽东经济经济圈。从明代前期起，辽东经济圈就吸引着大量的移民和北方少数民族部落的南迁。

透过纷杂的历史事实表象，究其最终极的动因还是经济问题。东北地区民族之间的关系也“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对该民族来说，唯一可能的原始生产方式下，人口的增长，需要愈来愈多的生产资料”<sup>29</sup>。他们向往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而辽东地带就是这些

<sup>25</sup> 参阅《全辽志》卷三《选举志·征辟》，第一册，页594-595。

<sup>26</sup> 参阅杨正泰《明代驿站考·增订本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sup>27</sup> 详见明官修《寰宇通衢·京城至辽东都司》，《明代驿站考》附录一。

<sup>28</sup> 《辽东志》卷三《兵食·武备·沿边城堡墩台》记载，分南路宁远等处，西路义州等处，中路广宁地方，东路辽阳等处，北路开原等处，以广宁为中心。页391-399。

<sup>29</sup>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页25、27，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